

1940年7月,县委调薛丕华同志回县工作,让我接任了四区抗联主任。在区委书记卜立功同志的领导下,我区广泛组织扩建游击小组、自卫队、情报网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,以对付敌人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并发动群众提高警惕,加强岗哨,一发现敌情,民兵立刻护送群众安全转移。游击小组分上各个山头,东山放个炮,西山打几枪,弄得敌人晕头转向,每到一处不敢久停。民兵们破路割电线,到处理地雷,更使敌人寸步难行。

建立情报网的工作,除各村都设情报小组外,还在东社、李家山等村设立了情报站,每站派专人送情报。规定有事插鸡毛,一刻不误马上送到目的地。

坚壁清野,依靠群众也搞得很好。把所有的粮食、衣物都藏起来,水井口盖好压上土,敌人进了村,空无一人,找不到吃喝东西,只好放火烧掉房屋退走。

由于我们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,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敌人,终于粉碎了敌人的“维持”阴谋,就连东社离敌据点虽近,但敌人也迟迟维持不了。

为了持久抗战,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实行“三三制”,坚持与各阶层团结合作,照顾他们的利益,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帮助。如编村村长阎定一,村副李友白,早在1937年薛丕华同志就叫我协助村政,开展我党抗日救亡工作,促其成为革命者和进步人士。我新政权刚刚建立,就任定一同志为小教,后任区长等职。并请李友白先生到区上,准备让他参加政权工作。敌人春季“扫荡”,他跟我们去打游击,我们照顾他年老寄托在老家乡,回来不久因病身亡未参政。

我们虽然实行“坚壁清野”工作,同日寇作斗争,但为了坚持持久抗战,仍然大力发展生产,加强经济建设。男人们在地里辛勤劳动,种好庄稼,妇女们在家里纺花织布,做好军鞋。尤其是那些妇女们,她们手里干着活,嘴里唱着劳动英雄歌:

“离石出了一个张秋林,她是咱晋绥边区的劳动英雄,七岁上学会纺棉花,十五上织布顶呱呱。革命到底铁了心,她送呀丈夫参军了。支援抗日呀救中国,她办起了秋林合作社。”

另外,我们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,上马头山上采草药,自扫硝土做炸药,克服敌人封锁围攻造成的困难,坚持对敌斗争,并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。在这一阶段我们在党政军民团结建设上是有进步的,正确的政策促成人民抗日的团结,廉洁的政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,顽强的斗争使敌人坐卧不安,因此敌人视我四区为其心腹大患,更加紧了对我们的“扫荡”和“蚕食”。

1940年秋,县委调我回县青干校任教育科长,调康大同同志来接任四区抗联主任。同年冬一天上午,县委组织部长白现元到了青干校,从课堂上叫下我来面谈:“四区三民小学生来县请愿,不要冯尚德同志当校长,要求陈清瑞任校长,县委决定派你去当校长,现在就去”。

我接受任务后马上就打背包动手,步行四十余里,赶天黑到达三民小所在地临县的钟庄。当晚深入师生了解情况,原来陈清瑞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,在师生中发展国民党组织。早在1940年3月,丕华同志就和我决定,在师生中发展一批牺盟会员,其中还要培养发展党员。当时我在小教中发展了一批牺盟会员,如樊毅等。并派冯尚德同志(共产党员)到三民小任教,开展牺盟会活动,该同志在学生中发展薛务升、杨元福等七八个会员成立了牺盟会组织,后调出原该校长雒鸿章去学习,由冯尚德同志接任校长。陈清瑞企图赶走共产党的校长,替国民党夺权,因此煽动学生县上请愿。经过我们深入地教育,大部分师生都知道受了骗,开始靠近我党,从思想上逐步觉醒了,继续安心地上课学习。但学校距离四区党委三十余里,师生吃粮还得去四区背,困难很多,我们取得县区党委的同意后学校迁回四区。白天站岗上课,晚上分散到学生家住宿,依靠党委联系群众,文武结合边教育边实践,

为抗战培育人才。在师生中发展薛春普、杨乃华、薛务升等同志为共产党员,选送了一批同学到晋绥一中深造,分配一部分同学到抗战需要的岗位工作,又招收了一批新生。国民党派忠实信徒在我区学校中争夺青少年学生的企图从此破产了。我们对陈清瑞等人,经过多方教育改造,只有陈清瑞死不悔改投敌了(1942年秋调我到三地委教育科工作,由临县陈子贞接任校长)。

从上面我军民反“扫荡”的胜利情况来看,日寇妄图把我抗日根据地政权,扼杀在摇篮之中。1940年春夏冬三次大“扫荡”,特别是6、7月间的夏季扫荡,对我区实行了残酷的“三光政策”。我区党政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,一面坚壁清野,一面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反“扫荡”、反“三光政策”的斗争,不仅粉碎了日寇的“蚕食”阴谋,而且我们在战斗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。同年10月间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,加强了对游击小组的领导,进一步开展了对敌斗争。

当时的敌我斗争是非常残酷的,许多同志为抗日而英勇牺牲了。日寇不甘心失败,继续在敌占区和边缘区开展“强化治安”运动,强迫群众维持。二区被敌人维持完了,1940年8月,区长雒贵岐等同志调到东五区,李晋仍留在武工队。后来贵岐回家探亲,被汉奸引上日寇抓到石门塆据点,敌人严刑拷打,刺刀扎,洋狗咬,但贵岐同志始终没有屈服,于1940年12月光荣牺牲。

1940年10至12月,日寇在惨无人道的冬季大“扫荡”中捕杀了不少党员干部。仅我知道的就有:塆口村干部阎双喜同志,在十月间被敌逮捕,在敌人的酷刑下不屈服,光荣就义。

同年冬寺沟井窑湾的薛福贵被敌人拉到石门塆据点枪杀。

同年12月,高家庄的雒生顺(是1939年我区两千五百余名群众向伪县政府请愿释放阎良田、雒逢钦等同志选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)和其弟生元,被汉奸日寇拉到石门塆据点用刺刀穿死。

还有西侧的薛元英、雒家庄的雒逢镜、崖窑塌的张文英等人,由汉奸警备队将日寇引到崖窑塌,正遇晚上召开妇女会,被敌人一下子包围起来,把该村民兵队长张文英当场打死,将薛元英、雒逢镜拉到三交敌据点杀害了。

从我区三民小的问题发生引起县委对学校的高度重视,我县假期集训小学教师期间,决定在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。训委会专设组织科,由我任科长,县委组织部张炳、白毅二同志参加。我们在全县的优秀教师中,接收邓向业等同志为中共党员,四区教师樊毅也在那次入了党。

1941年春,县委决定张炳同志回四区任区党委书记。当时正是日寇1940年的春夏冬三次“扫荡”被我军民粉碎后,又实施残酷“扫荡”,步步“蚕食”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政策”。敌人所到之处,浓烟滚滚,烈火冲天,无数房屋被烧毁,许多群众和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郝廷龙、李富珍等同志惨遭杀害。阎锡山也勾结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,土豪劣绅山后虎武俊杰,早就跑到石门塆据点当了汉奸村长。还有一些地主汉奸,有的公开投敌,有的或明或暗向敌维持,摧毁我村政权,中农也发生动摇,只有贫苦农民坚持对敌斗争,在蒋阎日伪夹攻下,我区的形势更加恶化,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。

张书记面对极端恶劣的形势,采取有效措施,一面组织分散的游击小组,转入敌后地下活动,在区村大中队部领导下形成一个战斗体系,对付敌人频繁残酷的“扫荡”;一面深入密切联系群众,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粉碎敌人的维持政策。敌人打虎先打头,汉奸带领日寇不分昼夜专来袭捕,但老张不畏强暴,镇静而又机智地坚持领导战斗,白天游击办公,晚上野外宿营,连年迈的父亲也在村外草棚住。

#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(一)

1941年的一天夜里,日寇汉奸特意出发到后庄村,先进家搜寻无人,后又到村外草棚抓捕张炳同志扑空,竟将其父亲活活烧死在草棚内。当时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,张炳同志化悲痛为力量,继续领导全区军民,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。针对日寇的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及“强化治安”、实行“维持”的新政策,采取了以下措施:

## (一)继续加强民兵武装

除县、区、村都成立了公开的游击队组织外,还在敌占领的大武、石门塆等大村,建立秘密民兵组织,打入敌人内部,表面上为敌办事,实则给我探听敌情,运送武器,除汉奸,送情报。

## (二)建立防线,破坏敌人交通线

我区处在敌沿,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围和深夜袭击,乃建立防线:以雒家庄、磨天岭为一防线,由雒家庄民兵监视三交之敌;池家峁、山塆为二防线,由西侧民兵监视大武、西属巴之敌;火山、垣则为三防线,由李家山民兵监视石门塆、店坪之敌。神仙山、张家山之敌,由上安、白家峁、结绳塆三行政村共同监视。

为使三防情报传得快,除各村设立情报小组外,又专门在崇里、俭崖局、任家山、土井壕、塆口、凤凰峁、黄圈塌、东社、青家塆、结绳塆设立情报站。每站派三至五人专门负责送情报。规定无事三天一报,有事插上鸡毛,一刻不能耽误。

我们还大破敌人交通线,在敌人“扫荡”必经之路,挖四丈宽八丈深的壕,平时架板通行,战时则抽掉木板,割断敌人交通线。敌人反破路,连续“扫荡”三十次,我游击队和民兵边打仗边破路,粉碎了敌人合击包围的阴谋。

## (三)配合主力反“扫荡”

为保卫群众,除采用游击战术反“扫荡”外,并与主力军、游击队配合开展反“扫荡”。1942年4月26日,三交、石门塆之敌一百四十余人,向我四区“扫荡”,我民兵配合十七团主力,在任家山与敌激战,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,击毙日军小队队长井上通和日伪军六十余人,敌中队长和情报官也在我手榴弹下毙命,我军共缴获三八步枪四十支,子弹一百零三支。

## (四)主动袭击敌人

为变被动为主动,1942年8月9日,四区民兵和三分区游击大队,出击店坪公路上的一股伪军,激战一小时,打死伪副队长及官兵十六人,缴枪八支,子弹三十发,骡马各一匹。

同年10月15日,敌从离石运五大车军用物资到大武,我民兵和当地驻军得到情报后埋伏在公路两侧,等敌到后发起攻击,这一仗俘日班班长松尾,烧毁物资,缴获洋马十四匹。

## (五)反维持敌后武工队拔掉敌据点

1942年7月,在县委王大昌、车守珠等同志的领导下,全县第一时间展开反维持斗争。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,将各村伪维持会人员,根据其罪行轻重,是否主动投靠敌人,分别予以教育释放、逮捕和制裁。我四区在十天内摧毁了三十五村的伪维持会组织,并在四十个村建立了民兵。

1942年7月,县委派阎志诚同志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,钻进敌人心里,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斗争。我四区大武,石门塆敌据点由李岗等同志负责。同年11月12日,武工队小组长雒逢钦、穆桂崇接到上级指示,准备拔掉张家山敌据点。经过一晚上周密计划,乘敌进城领给养,据点只有四个日寇一队伪军的良机,决定智取张家山。

我内线便衣王守海,先骗两个日寇到村里找鸡喝酒寻花姑娘,然后就地俘虏;另两个日寇被我支差苦力穆天有、王开一二人用酒灌醉,一个被推下碉堡跌死,一个枪毙了。消灭了日寇,我武工队雒逢钦、穆桂崇、李玉柱、胡世英率领群众百余人,一下冲进敌据点,伪军全部被俘,然后火烧了碉堡,整个战斗只用了五分钟。

同年7月,县委调我区委书记王云祥到敌区任秘密县委书记,领导党的工作,1944年又兼任武工队政委,不幸在乔家沟光荣牺牲。

## (六)军民大生产克服暂时困难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,敌人实行残酷的“三光政策”,军事上频繁“扫荡”,经济上封锁破坏。每到一地,房屋烧光,家具毁坏,财物抢走,妄图制造无人区。敌人严密封锁各个交通要道,不让盐米柴油以及棉花布匹等物资运进抗日根据地。再加上天旱无雨,种不上庄稼,因此,那几年我们真正到了无衣穿、无饭吃的地步,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。

为了克服这暂时的困难,我四区军民响应毛主席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号召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组织五百名民兵扛着镢头背着枪上了马头山,几天共开荒八百余亩。另外还组织妇女们纺花织布,她们边纺边唱着自编的小调:“标准布来自定织,左边纺来右边织,迟睡早起不停息,织出好布七八匹,吃了早飯去赶集,卖给咱们贸易局。”

## (七)办工厂实现军火自给

我县在1939年晋西事变时,中离特委给了二十多支枪,武器不足,除了打溃兵和缴获敌人枪支外,民兵发明了打牛枪运动,它虽然只能打一发子弹,但总比大刀、长矛强。这是我们民兵集体智慧的结晶。我四区民兵后来把马头山开开的八百亩地,当作军火田,人人扫硝,家家熬硝,加之我县武委会高鹤年、任仰山同志领导办起了一个军火工厂,自打牛枪、自造地雷和手榴弹,基本上实现了军火自给。

我们四区党、政、军、民靠团结一致终于战胜了日寇的残酷“扫荡”、步步“蚕食”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政策”,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最困难的岁月,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。

党史天地

市委党史研究室  
(市地方志研究室) 联办  
吕梁日报社

(据《吕梁党史资料》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 
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)